



CCES

CCES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系列

陈钊 陆铭\著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中国城乡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

Toward Balanced Growth with
Economic Agglomeration:

Empirical Studies of China's Urban-Rural
and Interregional Development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CES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系列

陈钊 陆铭\著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中国城乡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

Toward Balanced Growth with
Economic Agglomeration:

Empirical Studies of China's Urban-Rural
and Interregional Development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中国城乡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陈钊,陆铭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

(CCES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301 - 14962 - 1

I. 在… II. ①陈… ②陆… III. ①城乡建设 - 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②地区经济 - 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F299.21 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1623 号

书 名: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中国城乡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

著作责任者: 陈 钊 陆 铭 著

责任编辑: 朱启兵 袁 辉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4962 - 1/F · 213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em@pup.pku.edu.cn

印刷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1.25 印张 167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1 导论 / 1

1.1 空间的力量:密度、距离与分割 / 2

1.2 理解中国的城乡与区域发展 / 5

1.3 本书的内容与结构 / 10

1.4 研究中国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学术意义 / 16

2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与空间集聚 / 18

2.1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 / 20

2.2 城市发展中的空间集聚与规模效应 / 23

2.3 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中的认识误区 / 28

2.4 发挥大都市集聚效应:上海与东京的比较 / 32

2.5 未来城乡间统筹发展的目标及政策调整 / 39

3 中国如何在平衡区域发展时保持增长? / 42

3.1 工业集聚与地区不平衡 / 43

3.2 区域平衡发展:是否存在效率与均等的权衡? / 50

3.3 区域平衡发展政策的再调整 / 60

4 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与区域收入差距 / 65

4.1 全球化进程和地区间差距的表现 / 68

4.2 解释地区收入的决定 / 74

4.3 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分解 / 78

4.4 结论及政策含义 / 84

附录 数据来源和指标构建 / 86

5 中国的省际商品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 / 88

5.1 国内商品市场分割:度量、影响和决定因素 / 90

5.2 区域经济发展和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 / 94

5.3 国内市场分割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替代 / 102

5.4 国内市场分割的决定因素:经济开放扮演了什么角色? / 112

5.5 结论、政策及展望 / 124

附录 数据来源和指标构建 / 127

6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区域经济增长 / 129

6.1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亚洲和中国的道路 / 130

6.2 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知的和未知的 / 134

6.3 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模型和估计 / 137

6.4 结论及政策含义 / 147

附录 6.1 数据来源及解释 / 149

附录 6.2 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150

7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 153

7.1 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可以兼顾效率与平衡 / 154

7.2 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创新 / 158

参考文献 / 161

后记 / 173

1

导 论

在过去的三十年,国际产业资本与中国内地及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在沿海地区结合,这是全球化浪潮中最重要的事件,而且这一事件至今仍在继续。在经济集聚的趋势下,全局发展和区域平衡短期内是可以兼顾的,并且在长期内是可以统一的。中国必须选择“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道路。

一个转型与发展中的大国正在太平洋的西岸崛起,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交汇点上,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经济事件莫过于此。作为全球分工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经济崛起的故事从一开始就与空间结合在一起,并且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发端于那个南部小渔村的经济开放政策,不仅扣动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扳机,还启动了一个发展中大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恰逢全球经济刚刚经历滞胀,急需大量优质廉价的劳动力来重新整合全球的制造业,而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又是海运,于是,这场“时空交汇”的结果就形成了发生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国际产业资本与中国内地及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在沿海地区的结合。

然而,一旦试图深入探讨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城乡与区域经济发展,转型与发展中大国的特征就使问题变得复杂而独特。“转型”说明了“市场化”的力量不容忽视,“发展”意味着从传统城乡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的转变,即“城市化”的过程,而“大国”则预示着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又必然是在地区间差异巨大的初始状态下展开的。集“转型”、“发展”与

“大国”问题于一身的,当今世界首推中国。然而,让城乡和区域发展中的集聚与平衡问题变得更为尖锐的是,全球化的浪潮汹涌而至,经济的集聚趋势不可避免。于是,任何关于中国城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讨论,都不应该离开“市场化”、“城市化”与“全球化”的大背景。

1.1 空间的力量:密度、距离与分割

在中国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当中,核心的不外乎三个。第一,什么是最优的城市规模?这涉及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应该有多大,政府是否应当适度放宽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同时,这也涉及小城市应该有多小,以及小城市的发展和大城市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什么是合理的城市发展的区域布局?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这就涉及城市化是应当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特大型都市及都市圈,还是应当将大城市更为均匀地分散于全国各地,因而这这也是一个关系到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问题。第三,在工业集聚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这涉及如何在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集聚效应的同时,缩小城乡与区域发展差距,以及如何实施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调整。

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当我们讨论中国的城乡与区域发展时,一定不能忘了这一点。在我们参与的世界银行的研究项目中,学者们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类似的三个问题,分别涉及城市、区域与国家的经济发展^①。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东京那么大?”这实际上是在问大家,什么决定了城市的最优规模,如何理解世界大都市(比如东京、巴黎、首尔等)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短短几个字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日本东京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段因为担心城市过大而实施“首都功能分散计划”的时期,在这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东京的人口数量下降;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跌落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谷,这段时间被学者们称为“失去的十年”。类似的,韩国首尔首都圈的不断膨胀引起了其他地方的

^① 这个项目的研究成果将集中体现在即将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 2009》之中。

不满。为此,卢武铉政府制订了预算高达约8200亿人民币的“国家均衡发展五年计划”,其中的措施包括限制在首都地区新建工厂、鼓励企业迁入地方等。然而,五年下来的实施结果却是,地方人口不断涌入首都地区,首都与地方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只有一些中小企业迁往离首都地区较近的地方。^① 这些经验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城市发展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西伯利亚比较落后?”尽管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却地广人稀。世界银行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它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世界上有很多地方不乏自然资源,不乏优美的环境,但那里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却较为“稀薄”——表现为人口和经济活动的规模较小、密度较低。这个问题涉及如何看待一国内部区域间的平衡发展问题。在中国,要回答地理、资源、历史等各种条件差异巨大的不同地区如何协调发展,也必须先将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搞清楚。

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非洲国家那么贫穷?”贫穷的国家不只非洲才有,但非洲的穷国却尤其多,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经济规律?新古典的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只要要素是自由流动的,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就应该趋于收敛。然而,这在现实中似乎并没有发生,相反,全球化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世界。对此,新增长理论解释说,这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创新速度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学习速度。但是,这些理论却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有些落后国家或落后国家的特定地区实现了经济上的追赶,而另一些落后国家或其中的某些地区却始终落后。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这个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的联系。中国的一些相对落后的内地省份在面积、人口和经济总量上都可与一个发展中国家相比,那么,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现象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某些内地省份难以实现追赶?

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总结为空间经济发展中的“3D”规律。^② 也就是说,人口向更具有密度(Density)的地方移动、距离(Distance)的减少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分割(Division)持续存在。

① 参见《首都圈膨胀让韩国地方不满》,《环球时报》,2008年4月15日。

② 这个思想来源于在世界银行关于“世界发展报告2009”的工作会议上 Indermit Gill 的发言。

第一个“D”反映了经济活动中集聚效应与规模经济的重要性。由于城市的经济活动更为集中,规模经济更为明显,因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更快的发展,就应当首先发展城市而非农村。但是,这并不是说不要发展农村,恰恰相反,农村的发展需要通过城市的发展来带动,并且通过城市化,让更多的农村居民以进城的方式来分享经济发展的收益。对于缓解贫困这样的目标,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结论是,经济的持续增长是缓解贫困的根本动力。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和移民就是治理贫困的最重要的力量。当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如何让农村居民进城后,不会因为城市制度的某些缺陷而成为城市贫民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联系到中国,这也就为我们如何尽快解决“三农”问题,如何进行“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启示。

第二个“D”说的是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改进以及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无论是一国内部各区域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都显得更加“近”了,时间距离在减少。距离的“减少”和运输成本的降低进一步加剧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在空间上的分离,使经济集聚的程度得以加强,经济集聚的地区就可能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这能帮助我们正确看待中国各区域间经济集聚与平衡发展的关系。经济集聚在短期内的确会导致地区间差距的扩大,但要素的自由流动将使落后地区也能分享到发达地区规模经济的好处,并且只要集聚效应的发挥不是无限的,地区间的差距就会最终趋于收敛。一方面,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未流动的内地居民人均占有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将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当沿海地区出现的交通拥挤、环境破坏和地价上涨等“拥挤效应”超过由人口集聚带来的积极的集聚效应的时候,区域间的平衡就将到来。但这时,我们不能将“平衡”理解为经济活动水平的相同,而应该理解为生活质量的平衡。同时,在经济集聚过程中,蛋糕越做越大,这也为中央政府向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创造了条件。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仍在持续扩大。这固然部分地是由于东部地区集聚效应的潜力尚未完全发挥,但城乡与地区间要素不能充分自由流动,特别是对低技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限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这使得内地居民不能充分分享沿海地区经济集聚的好处。由此可见,实现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对于未来缩小中国的城乡与地区发展差距意义重大。

第三个“D”则预示着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将持续存在。为什么一国内部不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会最终收敛,而国与国之间的分割却始终存在?原因有二。首先,一国之内可以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但国与国之间对低技能劳动力流动的壁垒却总是存在的。不难想象,如果穷国中最高技能的劳动力带着“人往高处走”的念头都跑到发达国家去了,那么穷国追赶发达国家自然就变得更为困难了。例如,美国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就有大量高技能移民的贡献,对于落后国家,这造成了“人才外流”(brain drain)的困境。其次,一国之内,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政策使落后地区分享发达地区经济集聚的好处。然而,在国与国之间,却几乎没有以平衡国家间差距为目标的国际组织。这个规律告诉我们,如果中国的各个行政单位之间只是在政府管理功能上相对独立,而在经济活动上互为一体,那么未来城乡与区域的平衡发展就可以期待。相反,如果各个行政单位在经济上相互分割,特别是要素不能充分自由流动,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国与国之间的持续分割在中国城乡与区域间的复制。这很可能成为中国快速经济增长背后掩藏着的制约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需要我们引起警惕的方面。

核心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下面,我们将把中国城乡与区域的发展放到改革开放的动态过程中加以讨论。

1.2 理解中国的城乡与区域发展

我们已经指出,中国的城乡与区域发展是在“全球化”、“市场化”与“城市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全球化浪潮是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国际大环境,而此后的市场化与城市化过程可以视为中国经济适应全球化趋势的一种调整。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用图 1.1 来展示本书讨论背后的逻辑。这张图也是一个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与区域发展的故事梗概,总结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从图中可以看出,经济集聚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与区域发展的核心所在。



图 1.1 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与区域发展

如果我们分别以“市场化”与“全球化”来代表改革与开放的过程,那么图 1.1 左上角的四块阴影部分就描述了改革开放对经济集聚的作用。市场化与全球化直接导致经济的集聚。市场化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时代要素按计划指令进行配置的局面,要素的流动性得以加强,要素的配置效率得以提高。那么,要素又是如何流动的呢?这又离不开全球化的大背景了。全球化的浪潮使中国开始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受益于改革开放早期的优惠政策,或者说,受益于港口条件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条件而成为经济集聚的中心。而正是在这一时期,随着全球范围内出现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国际剩余资本需要借助重组全球分工体系来寻求更高的回报,于是,它们来到了中国。这正是本书一开始所说的故事——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资本与中国内地及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在沿海地区结合。

与此同时,市场化和全球化又通过促进市场整合而间接导致了经济的集聚。市场化进程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减少了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地方政府试图进行市场分割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也因此变得更为困难。同时,市场化进程中民营经济的迅速成长,成为打破地区间市场分割的重要力量。相比之下,全球化对于市场整合来说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即使国内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分割,只要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国内市场分割的危害也相对较小,于是,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的地方政府普遍采取了“对外开放、对内分割”的策略。另一方面,如果经济开放提高到一定的程度,它对整合国内资源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从而成为推动国内市场一体

化的力量。市场的整合使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得到重新配置,经济集聚逐步加强。此外,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化进程也促使劳动力要素开始从农村流向城市,经济活动也因此而进一步向城市集聚。

理解了经济集聚的形成机制,我们就不难看出,正是全球化、市场化与城市化加强了城市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集聚,而中国改革以来的事实表明,经济的集聚和城乡与地区间差距的扩大是同时发生的。

政策上的城市倾向与区域倾向也是导致中国改革以来城乡与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图 1.1 中右上角的三个椭圆代表了城市倾向政策背景之下,城市化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城市化本身加强了城市的经济集聚,有扩大城乡差距的作用。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最终会使当地农村居民获益,只要他们能足够充分地分享与城市化进程相伴随的经济增长,那么,城乡差距就应该在城市化进程中被缩小。我们的一系列研究证实,城市化确实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净效应。同时,我们也证实,经济政策的城市倾向特征直接扩大了城乡差距(陆铭和陈钊,2004;Lu and Chen, 2006;陆铭、陈钊和万广华,2005;Wan, Lu and Chen, 2006;本书第 6 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更多的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订的城乡政策就逐渐在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动。然而,这种城乡政策基本上是由城市政府单方面制定和执行的,因而,首先让城市户籍人口受益是城乡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我们看到,农村的劳动力流动仍然受到城市的控制,他们在享受城市公共服务上与城市本地的户籍人口并不平等,外来务工者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等都成为城市制约非本地户籍人口流入的重要手段。对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使得过多的农民被滞留在低收入的农村和农业领域,这降低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工资要求,使城市从中受益。在这样的城市倾向政策之下,虽然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收入也在提高,但是农民工在城市的劳动边际产出与其实际工资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因而,中国就出现了城乡工资不仅没有均等化,差距反而不断扩大的现象(陈钊和陆铭,2008)。我们的一系列研究表明,通过发展城市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和缓解贫困本身并没有错,但关键在于,要通过城市化和城乡间的劳动力流动使得农村居民充分分享城市发展带来的收益,否则,城乡差距就不会缩小。当代中国发展面临困境的原因恰

恰在于,农村居民未能充分分享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

类似的,以经济集聚为中间环节,图 1.1 中右下角的四个白色方框代表了区域倾向的政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差距的影响。从区域发展政策上看,经济开放的政策首先是在具有地理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实施的,实施的形式以建立享受特殊优惠政策的经济特区或经济开发区为主。其中,在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对外开放所建立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经济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高科技产业开发区”等,绝大部分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这种政策上的差异使得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更快的发展,直接加大了地区间发展的差距。地区差距扩大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地方保护主义的抬头。地区发展差距扩大后,落后地区往往由于更多从事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在国内贸易中能够分享的好处较少。因此,无论是出于提升当地政府政绩形象,还是出于改善国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都积极发展一些战略性产业。基于这种策略性分工的考虑,出现了新一轮的地区间重复建设,与之相伴随的,便是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弱势产业而采取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陆铭、陈钊和严冀,2004;陆铭和陈钊,2006;陆铭、陈钊和杨真真,2007)。特别地,在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财权下降,地方政府更迫切地希望依靠本地经济来加强地方财力,上述现象就尤为明显。

地方保护主义的抬头加剧了国内市场的分割,并因此有损经济的集聚。然而,这种因地方保护主义而导致的经济集聚效应的减弱并没有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相反,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更为扩大了。这是因为,首先,落后地区发展不具备本地比较优势产业的做法更多的是出于地方短期利益的考虑,越多的保护就意味着越多的效率损失。即使是那些出于长远的战略性目标而采取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也多少带有一厢情愿的色彩,往往也难以成功(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成功的可能性)。其次,虽然经济集聚效应发挥不足对发达与落后地区都有损害,但落后地区遭受的损失更大。因为与落后地区相比,沿海发达地区经济更为开放,能够通过国际贸易参与国际分工而获得较快发展,国内市场的一体化对这些地区来说相对不重要(参见第 5 章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需要回答,日益扩大的城乡与区域发展差距是否可能缩

小。图 1.1 指出了经济集聚在短期内有可能导致城乡与地区差距的扩大；但是从长期来看，只要要素（特别是低技能劳动者）能够充分地自由流动，城乡与地区间的发展就有望收敛。这是因为，理论上而言，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集聚的同时，内地通过要素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同样能够分享经济集聚的好处。此外，由于自然资源不能流动，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会使内地的人均资源拥有量增加，这将提高内地的人均收入。最后，随着东部沿海地区集聚潜力的发挥殆尽，拥挤效应将与集聚效应相互作用，形成城市规模的最优均衡状态，由沿海向内地的产业扩散效应随之产生，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也将趋于收敛。然而，发生在中国的实际情况却是，城市倾向与区域倾向的政策使得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不能在城乡或区域间充分流动。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日益扩大的城乡与区域差距是否可能缩小，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城市倾向和区域倾向的政策能否扭转。围绕图 1.1 右侧阴影方框中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我们认为现实中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乡差距的扩大会导致城市内部社会矛盾的加剧，并最终表现为城市资本积累速度的下降，城市本地户籍人口的利益也会受损。本书第 6 章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城乡差距的扩大的确会通过降低投资水平而对经济的增长造成持续的不利影响。也就是说，日益加剧的城乡差距会影响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将导致城市政府从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本地户籍人口的利益出发，减轻政策的城市倾向性。地区差距扩大后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使经济集聚受到影响的事实也说明，地区差距持续扩大将危害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地区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各种问题，类似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样的政策正是对原先倾向东部沿海的发展政策的一种调整。图 1.1 右侧的阴影方框及两个垂直的箭头刻画了上述这种为追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扭转城市与区域倾向政策的机制。城乡和区域发展政策、经济增长以及城乡和区域间的失衡构成了图 1.1 右侧的两个三角形关系，这两个“发展的三角”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在城乡和区域维度上的具体体现（陆铭等，2008）。

1.3 本书的内容与结构

应当如何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看待中国日益扩大的城乡与区域发展差距?在城乡与区域的维度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表现出怎样的布局?中国是否可能,以何种方式走向城乡和区域的平衡发展?这些都是实践层面上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也是政府制定与调整城乡与区域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本书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对此给出了回答。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城乡与区域问题总是交织在一起。理解中国的城乡问题离不开区域的视角,理解中国的区域问题也离不开城乡的视角,而城乡与区域发展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全球化、市场化与城市化趋势下跨地区的资源再配置,及其对增长与不平等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城乡和区域发展中的平等与效率、政府与市场这两大关系。

通过图 1.1,我们在涉及中国城乡与区域发展的重要环节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些联系有的属于理论推断,有的需要实证检验。对于其中涉及的理论研究,这本以实证研究为主的书不打算详细探讨。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作者近期的相关研究,如:地区间发展差距可能导致落后地区采取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从而加剧市场的分割(陆铭、陈钊和严冀,2004;陆铭和陈钊,2006;陆铭、陈钊和杨真真,2007);在城市单方面制定城市倾向政策的条件下,城市化进程反而可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陈钊和陆铭,2008)。下面我们围绕本书的结构安排交代书中所侧重的经验与实证方面的内容。

本书第 2 章和第 3 章主要从经验事实的角度总结性地分析改革以来城乡与区域发展的趋势、问题与对策。第 2 章从城乡的角度谈区域发展,其核心问题是,中国应该如何追求城市的合理规模与合理布局?图 1.1 中带阴影的方框再加上图中的三个椭圆,就能反映本书对城乡问题的把握。中国的城乡问题产生于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同时又与城市倾向的政策密切相关。虽然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趋势导致了经济集聚,带来了城乡发展差距,但是,第 2 章的分析表明,城市化进程的效率必须以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为保证,而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分割的政策则使得

城市化水平滞后、城市的集聚效应未能充分发挥。一个既能充分发挥城市集聚效应,又能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调整应当减少政策的城市倾向性,为要素的自由流动,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更好的条件。第2章还进一步指出,政府应当扭转在城市化与区域发展问题上的几个认识误区,并提出了未来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目标及政策调整的具体方向。

本书第3章着重讨论区域发展问题,其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在经济走向集聚的过程中平衡地区发展?我们将从空间的角度展现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向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集聚的趋势。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我们发现,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都对工业的集聚有所促进,并且城市规模经济效益对工业增长也存在正面的影响。此外,第3章还考察了中国区域和城乡发展政策的调整历程,并根据中央财政转移方向的变化,讨论政策变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试图回答:中国在平衡地区发展差距时是否牺牲了效率。在第3章的最后,我们还讨论了如何在实现经济集聚的同时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结合图1.1,第3章的分析主要涉及图中三个椭圆之外的内容,但正如前面指出的,中国的区域发展与城市化及城乡问题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接下来的三章涉及图1.1中的几个关键环节,都是中国城乡与区域发展问题中极为重要的讨论话题,而学术界对此又存在明显的争论或缺乏进一步的证据。因此,相应内容就更为技术性一些。这些内容既是为了让读者清楚地了解经济学研究与通俗的表述之间有何种关系,知道我们的观点有怎样的实证依据,也是为了展现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为当代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贡献。

第4章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全球化、市场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其中,我们特别关注全球化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因为学术界对此存在广泛而激烈的争论。我们发现,全球化显著扩大了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并且作用随着时间而加强。此外,市场化与城市化也加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但它们的作用正在减弱。读者不难发现,这些更为技术性的实证研究既为前面的图1.1提供了支持,而且还提供了更为细致的信息。

本书第5章特别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市场分割程度的变化、

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市场分割的决定因素。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市场到底是趋于分割还是更为整合,学界有不同的观点,而这恰恰又是判断中国市场化改革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维度。分割对地方的经济增长有何影响?对此展开研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地方政府纷纷采取市场分割行为的动机,以及可能存在的地方政府间相互分割市场的“囚犯困境”问题,这将为中央政府的协调与干预提供现实依据。市场分割又是由哪些因素导致的?通过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判断未来中国市场整合的趋势,找到推动中国市场整合的根本力量。我们发现,1985—2001年间中国的国内市场总体上更为整合。地方政府的市场分割行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的,而且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更能够从市场分割中获益,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都有动机去分割市场。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支持市场分割的政策。虽然各个地方均能从分割市场的行为中获益,但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却可能在总体上使得中国失去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我们还发现,经济开放在前期加剧了国内市场的分割,但更高水平的经济开放能够促进国内市场的一体化。除此之外,地方政府的干预是不利于市场整合的,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才是推动市场整合的根本力量。将这些发现放到图 1.1 中,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产生上述实证结果背后的机制。如图 1.1 所描述的那样,全球化与市场化的确造成了地区间的差距,这就使地方政府有动力借助于分割市场来发展本地经济,而经济开放和国际市场的进入在早期则为分割国内市场政策的可能性提供了现实条件。

第 6 章讨论不平等对增长的影响。现有的实证研究因数据、方法的不同而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关于中国的经验证据就更少了。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我们认识未来中国的城乡与区域发展却尤为重要,在中国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时候,我们急需经验证据来说明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果城乡或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损害甚至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那么人们将更倾向于认为,发展或增长才是首要任务,城乡或地区间的不平等可以通过事后的财政转移来加以控制。这样,我们就很难期望控制收入差距的政策得到社会的共识和政府的重视。本书第 6 章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在短期